

史料细化与视野转换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省思

谭徐锋

【提要】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文献考订与校勘依然任重道远:清末期刊的各种版本差异颇大,单行本、重印本与汇编本往往不同,甚至存在不小的差异,需要引起注意;部分重要文本的作者尚有待考订,可以根据前后左右的因缘加以厘清;既有重要文献集需要汇观、深耕,关键文献还有待搜寻,新披露文献值得充分利用。研究视野方面须重视反革命与不革命派的研究,将辛亥革命放到甲午战争到国民党“一大”这30年的历程中,注意南北差异、边地与内陆、区域不同步;由实入虚,将全球史、微观史、概念史、记忆史、情感史、生活史、疾病史、图像史等新视角引入,将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 辛亥革命史 史料整理 方法论 新史学

武昌起义爆发11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甚至有人发出题目已经做完的浩叹。不过,经典作品毕竟未如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那么众多,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其复杂程度绝不亚于法国大革命。此前不少前辈曾经讨论过如何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问题,^①笔者不揣浅薄,结合自身研究与从事文献整理的经验,试着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史料收集与运用

文献考订与校勘依然任重道远。第一,清末期刊的各种版本差异颇大,单行本、重印本与汇编本往往不同,甚至存在不小的差异。尤其是时常为人征引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刊物的类似情形比较多,有必要在当下发达的数据库建设基础上,充分比对各种版本的差异。与此同时,鉴于某些出版社没有严格遵守古籍整理的行规,擅自改动原文,引用权威版本甚至比原初刊本更好。因此,文献整理有必要精细化,将不同版本一一呈现,并由专家添加注释,这一工作在近代史学界还有待开展。

第二,部分重要文本的作者尚待考订,可以根据前后左右的因缘加以厘清。比如,《浙江潮》连载的《民主主义论》一文,由于署名为“余一”,此前研究者在引用时,就未曾注意到此文出自蒋百里之

^① 如章开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收入章开沅著《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章开沅的《辛亥百年遐思》(《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严昌洪、马敏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等。

手。笔者在整理《蒋百里全集》时根据相关线索,考订出此文作者系蒋百里。^①

第三,此前研究多未充分注意各种思潮的日本、西方源流。事实上,很多文章是在日本思想家的文本基础上修改而成,^②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时评,大多数是在日本当时相关时评的基础上改定的。又如《游学译编》所收的《民族主义之教育》,该文原注有“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③此前研究者在引用时,没有注意这段原注,更遑论对这一文本如何增益进行考论。

第四,关键文献还有待搜集。比如,由孙中山创办,刘成禺、蒋梦麟具体操持、写了三年社论的旧金山《大同日报》,^④笔者遍托海内外师友代为查找,依然未有踪迹。此报收录了大量社论,蒋梦麟本人就有数百篇社说发表,无疑是研究辛亥革命及刘成禺、蒋梦麟的重要史料渊藪。

以此类推,当时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以及海外的外文报刊,也值得注意。^⑤这些报刊的数量和持续时间都很可观,此前发掘不多,很多只是选译的片段资料。而保存完整的英国外交部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等有不少涉及辛亥革命的英文、日文资料,学界利用不多,可从中挖掘许多新史实。又如,台北所出《革命文献》、各地同乡会文献、《传记文学》,此前在大陆只能管中窥豹,多为选摘本,现在都能很方便地看到,其中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回忆录很丰富。加上不少大型报纸数据化后,便于查阅,因此,更有待全面重申。

尽管存在这些客观问题,但近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料。尤其得益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很多难得一见的文献得以出版,如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必读文献的《赵凤昌藏札》。^⑥该影印本问世十多年来,除了李志茗等人,^⑦至今充分利用者并不多。当然,与此文献密切相关的盛宣怀档案也极为丰富,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⑧已整理者有《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三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两册,^⑨可以和《赵凤昌藏札》并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的晚清人物文集、日记、档案,有不少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稿本、抄本文献也大量影印出版,如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共三辑,457

①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2、5期连载,未完,此文为《浙江潮》创刊号排列第二的“社说”,可见其重要性。收入谭徐锋主编《蒋百里全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由狭间直树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现有中译本,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袁广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对此有很好的揭示,但笔者要强调的是,一些日本思想家也是吸取欧美思想家的作品改造而成,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思想交流的循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仁过于关注中日之间这一层面,无疑是不完整的,甚至对于梁启超的评价也是不公允的。

③ 此文为该期头条,原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印刷,十五日发行),后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④ 蒋梦麟《西潮》,世界书局1975年版,第85页。

⑤ 左松涛近年一直在搜集海外英文报刊上的康有为、孙中山资料,收获颇丰。

⑥ 《赵凤昌藏札》又称“近代史料信札”,原件藏于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库,共36函,109册。系清末民初闻人赵凤昌与当时各界高层人士往还信件、电报的合辑,还包含部分其子赵尊岳的信件。今已影印出版,参见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⑦ 李志茗的研究侧重于赵凤昌本人及晚清督抚。其实,此资料集包容很广,如能结合新旧资料,可研究的内容甚多,参见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⑧ 《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⑨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

册,^①包括晚清督抚张之洞、锡良、张曾敫、李盛铎、端方、劳乃宣等人卷宗,涉及清末新政时期各地政局与社情。王建朗、马忠文主编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计80册,^②收录奕譞《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沣《使德日记》、张朝墉《半园日记》、华金寿《督学山左日记》《督学中州日记》等名人日记,反映了各界在动荡时代的抉择。这些日记的作者多为辛亥革命前后督抚重臣、北洋高官、名士学者与世家子弟,尽管此前有所披露,但多为选本,因此,该丛刊具有珍贵史料价值。^③

近年来,地方史料汇编的出版层出不穷。例如2011年出版了《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湖南辛亥革命史料》《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辛亥革命广东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与天津档案资料选编》《福建辛亥革命史料选辑》《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2012年出版了《〈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2013年出版了《武汉市档案馆馆藏辛亥革命档案资料汇编》;2014年出版了《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等。目前学界对湖北、浙江、江苏、湖南等地辛亥革命关注较多,其他省份的研究还应加强。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积极推动辛亥革命文献的出版。例如2011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辛亥革命文献》《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与此同时,孙中山相关文献也有更新与扩充。2015年出版了尚明轩主编的《孙中山全集》16卷;2017年出版了桑兵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和《孙中山全集续编》。

在口述史料方面,2016年出版了《孙中山研究口述史》12卷本,2019年出版了《陕西辛亥革命后裔口述史:细说陕西辛亥革命》,这些资料在利用前仍需要严格考证,不能贸然使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广泛搜集同盟会后人的信息,并对其进行采访,来往书信正在整理过程中。^④这批书信除了可以校正一些历史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证辛亥革命参与者的家族命运及近百年的辛亥革命记忆。类似的历史资料,各地文史资料委员会也做过一些努力,值得搜寻出版。

顾炎武曾提倡著述要“采铜于山”,而不要贪多务得。当下各类数据库发达,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研究者不惜出差到京沪各重要收藏机构手抄资料的辛苦,“采铜”于“网”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已非难事,如何充分利用这种便利,进行各种文本的搜集、比对与校正,是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提,否则其学术成果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令人生疑。

不过,最令人遗憾的是,个别研究者对于后出转精的文献关注不够。比如,《翁同龢日记》早年版本存在很多疏漏与涂改,后出的版本更为精善,^⑤但一些研究者甚至知名学者似乎未注意到这种变化,依然引用早年版本,殊不知二者差异很大,甚至影响对事实的判断。又如,丁文江、赵丰田所编

① 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共计三辑,分别由大象出版社于2012年、2014年、2015年出版。

② 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

③ 笔者注意到,蒋百里曾提到浙江巡抚张曾敫邀请他回乡主持练兵事宜,张氏的原信就收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类似现象如果按图索骥,此前不为人知的文献很可能还会披露。当然,也要注意,这里所收督抚档案并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馆)所藏全部,如张之洞卷就仅收入部分,剩余部分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正在牵头整理这一批文献,近年有望出版。

⑤ 《翁同龢日记》现有四个版本,分别是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中华书局2006年版(陈义杰整理)、中西书局2012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版(翁万戈编,翁以均校订)。最后两版为翁万戈根据家藏文献整理,不仅增加了两种军机处日记,即《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日记》《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日记》,还增加了翁同龢早年参加学政会考及随父翁心存护送道光皇帝梓宫入西陵时所记日记两种,即《己酉夏南归赴试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初六日)和《庚戌恭赴西陵日记》(道光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此外,还增补了翁同龢自订年谱(原名《松禅年谱》)及其侄曾孙翁之喜所作的《松禅年谱补》。当然,被翁同龢后来挖改(剪贴)删隐的内容,后两版也全部予以复原。

《梁启超年谱长编》有多种版本,现在学界经常引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但中华书局2015年影印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①所收文献远远超过此前的通行版。同样是关系到梁启超研究,《梁任公知交手札》此前大家经常征引者为台北影印版,殊不知台北早有整理版,^②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疏漏。

总之,新旧文献的汇通处理有待加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既需要研究者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相关机构的组织与倡导,这样才可能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来。

二、方法与视野

由于辛亥革命是晚清民国起承转合的重要关键,可以说,辛亥革命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嘉道之际到1949年)的“腰”,不充份理解辛亥革命,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为了避免“只顾埋头拉车,不去抬头看路”的局限,有必要从研究方法上视野上进行反思,提出新议题与新视角,促进研究的深入。

此前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虽然不少,但主要关注革命派。其实,除了革命派的研究,也需要重视反革命与不革命派的研究,而且这一势力更大,所保存的文献也更完整。对这些革命派之外的研究,既可以借助他者的视角认识革命派,也可以对当时各种派别的联动与牵制有进一步理解,从而深化对当时整个历史情境的认知。

章太炎曾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③这里所说的,对于我们重审此前的不少辛亥革命史研究可谓若合符节,此前基于立场先行的研究,现在需要更加心平气和地进行重审,才能对史事有更加公允的看法。关于王朝政治最重要的两项建制——皇权与科举,近年来对于清末废科举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在不少国人“礼赞”日本的明治天皇时,皇权在清末是如何日趋负面,为何皇权在中国最终要被打倒,这一过程与反差有待深入研究。

如果留意一百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史,我们会注意到,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即使是这些研究,伴随着史料的扩充和视野的转变,依然有新的研究空间。如尚小明《宋案重审》就突破宋教仁被刺这一事件史的路径,注意到“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发掘利用”,将新旧文献进行比对与拼接,对“宋案”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解释。^④

就研究时长而论,有必要将辛亥革命放在从甲午战争到国民党“一大”这30年的历程中,因为其中改良、革命、立宪之间的互动,其实是反复拉扯,有进有退。就武昌起义这一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但放宽视野,多种势力的角逐,朝野之间的互动与分歧,还有不少议题值得讨论。

就相对“实”的层面而言,此前研究宏大者多,细部仍然不够;对内多,对外少。不少专题史料集,此前只是围绕政治史做了一些讨论。这好比一处富矿,挖掘者只将主要或自以为主要的矿藏挖走,其余方面被荒置,而好的发掘方式是“竭泽而渔”。在研究视角上应专门讨论如何从外国、外人的角度展开,当时英美法俄日等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国内政治各派的交涉,在华传教士、军官、记

① 版本的具体差异,参见夏晓虹《〈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材源考》,《中国文化》第43期,2016年春季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编辑岛田虔次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仁数十年注释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注疏版,预计2022年推出。

② 张子文主编《梁任公知交手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该书将原件与释读文本一起刊出,方便研究者参考。

③ 章太炎《再与人论国学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

④ 尚小明《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者、商人等群体对辛亥革命的感受等,都可进一步展开论述与分析。

厚重的书信集,如著名人物来往书信集《汪康年师友书札》《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①孙中山来往函电,除了主要人物外,其余二三流人物,即使书信达三四十封,也没有引起重视,更谈不上研究,这其实还是有此前重要人物研究的路径依赖,只抓大人物。殊不知独木难成林,大人物需要其周围的人物来烘托托月,大人物整个社会交往的远近高低、形形色色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生动的社会面相。

要由小见大,从整体视角解剖一只麻雀,需要更深的功底。比如,辛亥革命如何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市镇、一个县域兴起就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清末日记、文集、方志、地方报刊、档案的丰富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素材。^② 萧邦奇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从个体生命史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沈玄庐的生命史做了很精彩的梳理,^③类似的研究路径亦适用于当时很多的革命参与者。

相对“虚”一些的层面,如对情感、记忆、性别、疾病、个体生命感受、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不够;对思想与观念的分析虽然不少,但对思想的源流与传播、受众的反响关注较少;对男性的思考已经很多,但对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如何感受这场革命与变动不多;从成年人尤其是壮年人的视角观察较多,对少年、老年人如何观察这场革命的研究较少。这些层面,借助保存丰富的日记、书信甚至文学作品,可以细致地呈现出来,当然要避免简单的罗列,而是将个人的生命史与大环境的变动嫁接起来,小中见大,为整个革命前后的“大气候”增加更多深描。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留学生由于身居异国他乡,饮食不习惯,加之生活习惯的差异,不少人身患痔疮,甚至久病医治无效而去世,黄尊三日记对此多有描述。^④ 另外,怀乡最终导致精神紧张,甚至罹患精神病的现象也很常见,如黄尊三就自称有精神病,宋教仁日记也有类似自述。^⑤ 当时不少烈士的自杀,除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与时势刺激以外,精神状况的紧张,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何从生活史、疾病史的角度重建革命志士与留学生的生活世界,值得学界重视。

如何由“实”向“虚”,将感性与鲜活的历史叙述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进而将辛亥革命的“骨骼”与“血肉”一并纳入考察范围,立体地接近辛亥革命现场,是未来值得全力以赴的。如辛亥革命的亲历是参与者的重要文化资本,在参与者身上有很多遗存,黄花岗起义参与者莫纪彭书法就钤印“黄花岗之役第三队先锋队队长”,这一当年经历成为其重要的记忆并随时在书法中示人。

辛亥革命前后读书人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他们不仅写时评与社说,还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尤

① 此书中文版有不少删节,有必要参考英文版(Hui-Min Lo,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1895-19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1978;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1912-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莫理循书信集原件收藏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的米歇尔馆(Mitchell Library),较英文版又多出许多倍,这一点承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贤博士提示。

② 王汎森最早提醒学界应该注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在地化研究,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法国大革命史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成果,比如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最近,日本学者佐藤仁史对辛亥革命前后嘉定、吴江等地的政局与教育情形做了研究,参见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④ 黄尊三《黄尊三日记》,谭徐锋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⑤ 参见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类似现象不仅仅在留日学界,在欧美留学生身上也有反响,只是我们以前对此没有重视。

其是诗词与书画,也寓意不浅。由于学科细分,此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将辛亥前后诗词、诗话、书画研究置之度外。殊不知当时的诗词、书画也是作者人生观、社会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柔软的一部分。有前辈曾引用“张之洞晚年《惜春》一诗,来说明张氏对自身新政活动‘事与愿违’的可能后果并非一无所知一事”。^①这些心境,只能在诗词中袒露,一般的文稿似乎无法也不便透露。

此前有人提示过要注意南社同仁诗词的情感世界。^②革命主将黄兴的诗词、书法造诣皆佳,康有为、郑孝胥等人的诗词、书法造诣冠绝当时,这里面不仅仅关系其艺术造诣,更关系情感、政治态度,包括师法的对象、诗词结社的圈子。郑孝胥《题黄鹤楼图》云“武昌一哄由弄兵,使我在湘鄂易平。”其自负可以想见。不仅旧派写诗,革命派也写诗。^③史学界不应该将这些具有文化表征的重要切面拱手相让,而应该将其纳入人物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当然,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精通诗词,还要善于辨识书法及其源流,否则就可能束手无策。

宏观一些的改变,如全球史、南北差异、边地与内陆、区域不同步等,^④值得以一个议题、事件或人物作为引擎,将这些重大的关照引入进来。彭春凌研究章太炎如何译介斯宾塞《社会学》就是一个相当精彩的题目,^⑤该研究将辛亥革命要角章太炎的思想嵌入全球史的脉络,对比了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的1858年版、1868年版和1891年版,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原刊本,再对照章太炎的译文,指出章太炎翻译所据底本为1868年版,穷根究源,为理解章太炎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按照全球史的思路,革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重要思想都可以有深度研究,从而更全面地展现辛亥革命时期重大观念的来龙去脉。

中国作为面积与欧洲相当,人口更远多于欧洲的国度,当时交通依然不便,可以说一个省就相当于当时欧洲一个国家那么复杂,如果充分注意到南北差异、边地与内陆等差异,从中发掘题目,进行比较,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笔者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期间,就注意到袁世凯称帝的洪宪年号,在袁世凯死后一两年,山西部分乡村契约依然沿用,^⑥而且很常见,这在古代是关系到正朔的问题,误用甚至会被杀头。这就提示我们,中央与地方、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很可能存在严重不一致的问题,而为何不一致,不仅是现象,背后因素更值得进一步讨论。

除文字材料,图像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对《清议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民报》等报刊,此前的研究多是追寻其思想脉络,但是对于整个报刊的装帧、图像似乎并不关注,殊不知这是受西式乃至日式报刊装帧的影响,同时又广泛搜寻中国古代先贤的图像与遗迹,如尧舜禹、宋末明末遗民,呈

① 参见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后来张春田对南社有专题研究,参见张春田《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1903—192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 郑孝胥的书法影响极大,当时上至清废帝溥仪,下至知识界名流胡适、徐志摩、钱锺书都是其书法的仰慕与追随者,这一现象因为郑氏后来参与伪满洲国晚节不保而不彰,其实值得深入梳理。清末民初碑学的复兴,有人不见得模仿康有为书风,但对于碑学的重视却很常见,蒋百里因为仰慕梁启超的为人,甚至书风都跟梁氏极为相似,此前似乎很少人注意。关于郑孝胥的诗词成就,参见潘伯鹰《海藏楼诗的解剖》,《生活》第3期,1947年9月。

④ 罗志田对此有提示,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⑤ 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⑥ 类似文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有不少珍藏。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但是,这一现象如何影响社会与日常生活,依然值得进一步考察。

现了文本之外的世界。这里面虚虚实实,倒不一定是真迹与本尊,但如何采择与排列,却事关当时读书人的所思所想,不可忽略。^①

余 论

辛亥革命史研究乃至所有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说完全无人涉足的领域近乎没有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现象似乎比较严重,就是对于前人的研究不够重视,甚至故意视而不见,最多罗列一下篇目,而没有充分吸收其中的合理因子,似乎自身的研究是盘古开天第一遭,即使先行研究是出自大家名家之手,也不乏不引用、不参照的情形,更不要说对海外研究的关注严重不够。章太炎说“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②此处所指陈的现象值得重视,否则容易造成学术资源的重大浪费。

既有辛亥革命文献与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或许有失粗略者,但也不能成为截断众流式研究的借口,先行研究如有可吸取处,必须一一注明与尊重,进而发挥和深化,否则就是违背学术伦理的大忌。当下的学术条件,梳理先行研究不是难事,但不能局限于所谓的数据检索,一些论文之外的专著、论文集集中的专篇,甚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纸的史学专栏论文也有必要认真参考,其中有不少扎实的论述。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值得尊重,除了是否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之外,是否拥有严格的学术伦理、朴实健康的学术风气更为重要,这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学术领域与学术共同体的命运。

辛亥革命关系到从帝制时代到共和时代的千年转折,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但此前由于政治史研究的衰微,导致相关研究有所减退,揆诸事实,其实值得拓展的空间还很大。鉴于辛亥革命前后史料的繁复与厚重,如果迎难而上,可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对于中国,不亚于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但相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经典迭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还远远不够,至少能称得上学术名著的作品并不多,这亟待激活新议题与新思考。

(作者谭徐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邮编:430079)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石川祯浩对此有所揭示,他详细考订了清末留日学界的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参见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他将黄帝的画像与明治天皇相提并论,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证据不足,推论稍显大胆。其实清末民初报刊的图像极为丰富,其制作过程、选材与标识,值得深入发掘,可以提炼出不少有趣的话题。

② 章太炎《再与人论国学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72页。

constructing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id Liang Qichao Invent the “China is a Sleeping Lion” Thesis? // Zhang Zhaoju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questioned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the “China is a sleeping lion” Thesis. They argue that the “sleeping lion” thesis is just a fabrication by Liang Qichao, and explain that Chinese national vanity gave rise to its popularity. This article argues otherwise.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hat the phrase “Chinese is a Sleeping Lion” had appeared in Japanese newspapers no later tha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e analogy came up in Ozaki Yukio’s “Crisis in Toyo” and Osawa Ryu’s “On Shina”, which were both earlier than Liang Qichao’s “Talking About Animals”. According to Ozaki and Osawa, the “sleeping lion” thesis came from the West and was related to Westerners’ overall judgement on China’s national power as an excuse to invade China. Ozaki quoted and opposed this theory to promote the “China Conquest Theory” to make an excuse for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Whereas Ozaki quoted this theory to advocate the theory on “preserving China” in service of Japan’s Asianism. From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the current scholars’ misjudgement is largely due to the use of “argument from silence”, but they don’t strictly abide by its restrictions, which conf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ulation and evidence.

Refinement of Primary Sourc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 Reflection on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 Tan Xufe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1911 Revolution remains underdeveloped,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collecting and edit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example, the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ten exist in various formats, including single issues, reprints, and compiled volumes. Their contents sometimes vary greatly, which demands our attention. The authorship of some important texts has yet to be confirmed, and one might be able to further clarify this issue based on studies of their context and causality. Researchers also need to study the existing primary sources in both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ways; they need to not only look for more key materials, but als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recent disclosed documents. In terms of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historia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udies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factions. They also need to place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30-year process from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In addition, they need to he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borderlands and the interior, and the asynchronism among various regions. Meanwhile, in order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ir research scale, historians should introduce new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and move away from conventional research 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o new fields, such as global history, microscopic history,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history, emotional history, life history, disease history, and image history, etc.

Global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 Review and Some Reflections // Liu Wenming

As a concept, “global history”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1980s through translated works on global history from the West. A discussion of its theory began in the 1990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was on the “global views of history”. It then discussed on how to compile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includ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such a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new maritime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t applied global history theory to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further developing into empirical and microcosmic studies, the quantity of research works on global history in China has increased. For example,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Global History Review*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8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pers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on global history based on original research is on the rise. At the same time, some monographs of global history have also appeare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For example, a simplistic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history” has led to a lack of in-